

## 天鵝絨分離——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離談判 機制與國際地位演變

葉紘麟\*

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 摘要

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3 年和平分離，成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主權國家，「天鵝絨分離」是歐洲少見、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和平非暴力國家分裂案例。本文分析當年分離談判過程及其和平成功的關鍵因素，並評估和平分離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捷克斯洛伐克自 1918 年脫離奧匈帝國獨立以來，捷克與斯洛伐克在經濟、文化與民族認同上的長期分歧，成為斯洛伐克分離意識的主因。1989 年天鵝絨革命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市場化改革的落差，加劇了雙方對聯邦結構想像與經濟政策上的矛盾，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也告抬頭。分離成功在於兩國政治精英的戰略遠見與互利談判，相對於 1990 年代南斯拉夫的暴力衝突形成鮮明對比。分離後，捷克迅速融入西方，並成功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國際地位顯著提升；斯洛伐克初期雖經歷經濟動盪與民主化風險，但之後也順利加入北約與歐盟，逐步確立穩定的國家地位。除了歐盟與北約外，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國都是維塞格拉德集團的成員，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層面都有緊密的合作關係。本文採用歷史分析法，探討分離如何反映民族認同與地緣政治的交互作用，並透過本案例對多民族國家的和平分裂提供啟示。

**關鍵詞：**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分離、瓦茨拉夫·克勞斯、弗拉基米爾·梅恰爾、維塞格拉德集團

---

\* shozaemonjp@gmail.com。

## 壹、緒論

「天鵝絨分離」(Velvet Divorce) 作為 20 世紀末歐洲政治版圖重塑的重要事件，以其和平、非暴力的特質在同期充滿血腥衝突的國家解體浪潮中獨樹一幟。1993 年 1 月 1 日，擁有 74 年歷史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正式分裂為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這一歷史性轉折不僅標誌著中歐政治地圖的重新繪製，更為國際政治學界提供了研究多民族國家和平分離的典型案列。冷戰結束後的東歐劇變浪潮中，多個多民族國家面臨解體危機。南斯拉夫的血腥內戰、蘇聯的暴力衝突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形成鮮明對比，使天鵝絨分離成為和平解決民族衝突的成功範例(Holigová, 2017)。這一現象引發學界對以下核心問題的深度思考：在何種條件下多民族國家能夠實現和平分離？民族主義如何從文化認同轉化為政治動員？國際結構變遷如何影響國內政治進程？分離後的國家如何重塑國際身份並維持區域合作？

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為：天鵝絨分離為何能以和平方式實現？次要研究問題包括：(1)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如何從文化認同演化為政治分離訴求？(2) 1989 年到 1993 年間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爭執如何逐步激化至分離？(3) 分離談判過程中哪些因素促成了和平協議的達成？(4) 分離後兩國如何重塑國際地位並維持友好關係？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天鵝絨分離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反面對照案列。在 1990 年代民族衝突頻繁爆發的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深刻揭示了政治精英的戰略智慧、制度化談判機制、以及相互尊重的民族關係對於避免暴力衝突的關鍵作用。這對當今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多民族國家（如加拿大、西班牙）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 貳、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歷史建構與政治演化

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是理解天鵝絨分離的關鍵。作為一種複合性的政治現象，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融合了文化復興、宗教保守主義、政

治自治以及反外族統治等多重元素 (Nikodým, 2023)。本章回顧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從 19 世紀至 1989 年的演化軌跡，揭示長期文化與經濟差異如何逐步轉化為政治分離訴求。

19 世紀的民族意識覺醒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萌芽提供了思想基礎。在奧匈帝國的二元君主制結構下，捷克人受奧地利（日耳曼）統治，斯洛伐克人則處於匈牙利（馬扎爾）統治之下。這種不對稱的政治地位為兩民族的差異化發展埋下伏筆。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作為 19 世紀歐洲興起的重要民族主義運動，主張所有斯拉夫民族在文化、語言和政治上的團結，以對抗日耳曼、馬扎爾或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的統治。對於斯洛伐克而言，大斯拉夫主義提供了兩重意義：一方面為其與捷克的聯合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另一方面也為其獨特民族認同的建構提供了理論框架。

斯洛伐克語言標準化是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里程碑。盧多維特·什圖爾（Ludovít Štúr）於 1840 年代系統化斯洛伐克語，出版《斯洛伐克民族報》並創辦斯洛伐克聯誼會（*Matica slovenská*）文化協會這些舉措不僅抵制了匈牙利的馬扎爾化政策，更為斯洛伐克民族認同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n.d.）。什圖爾的語言改革超越了純粹的文化層面，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通過建立獨特的語言標準，斯洛伐克人得以區別於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為後來的政治自治訴求提供了文化合法性（Gluchman, 2022）。主張斯拉夫民族在奧匈帝國框架內的平等地位與自治權）與什圖爾的合作，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主義」（Czechoslovakism）的萌芽，即將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視為密切相關的斯拉夫民族。然而，這種早期的合作並未消除兩民族間的差異，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斯洛伐克對平等地位的期待（Tonu, 202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重構為中歐民族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歷史機遇。1918 年，捷克與斯洛伐克僑民在美國簽署『匹茲堡協定』，<sup>1</sup>同意建立

---

<sup>1</sup> 『匹茲堡協定』於 1918 年 5 月 31 日在匹茲堡簽署，規定斯洛伐克將擁有自己的行政機構、議會和法庭，斯洛伐克語將成為官方語言。然而，正如學者所指出（Barbieri, 1992），馬薩里克後來承認該協定僅是為了安撫希望斯洛伐克獨立的派系。

聯合國家，斯洛伐克享有自治權。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與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š）積極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統一概念，為新國家的合法性建構提供理論基礎。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更多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考量而非真正的民族融合（Barbieri, 1992）。捷克地區擁有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斯洛伐克則以農業為主，這種經濟互補性雖然提供了聯合的實用價值，但也埋下了結構性不平等的種子。<sup>2</sup>

戰間期的政治實踐，暴露了捷克斯洛伐克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匹茲堡協定』承諾的斯洛伐克自治權未能完全實現，布拉格的中央集權政策導致斯洛伐克感到被邊緣化。這種政治邊緣化體現在多個層面：（1）政府高層與行政職位多由捷克人把持，斯洛伐克人的政治參與受到限制；（2）經濟政策優先支持捷克的工業發展，斯洛伐克投資不足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3）文化政策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統一認同，實際上強調捷克語的主導地位。

斯洛伐克人民黨（*Hlinkova slovenská ľudová strana*, HSĽS）的成立與活動標誌著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政治化轉向。由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領導的 HSĽS 將天主教保守主義與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相結合，強調斯洛伐克的文化、宗教和語言獨特性。該黨的意識形態融合了多重元素：天主教價值觀與反世俗化立場；民族自決訴求，要求斯洛伐克擁有自己的議會、行政機構和文化自主權；反共產主義立場（Tomas, 2023）。1925 年的『斯洛伐克民族宣言』明確提出了聯邦制和自治要求，標誌著斯洛伐克民族主義從文化運動向政治運動的轉化。

1938 年的國際危機，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激進化提供了外部催化劑。『慕尼黑協定』和『第一次維也納仲裁』（1938）進一步削弱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凝聚力。第一次維也納仲裁將斯洛伐克南部（約 10,390 平方公里，約 85 萬人口）割讓給匈牙利，領土損失激化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主義情緒（Komjathy, 1979: 130-36）。這一決定未徵詢捷克斯洛伐克或斯洛伐克的同

<sup>2</sup> 托馬斯·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奈斯積極推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這種理念更多基於地緣政治考量，而非真正的民族融合（Nikodym, 2023）。

意，領土損失激化了斯洛伐克的民族主義情緒，HSLŠ 領袖約瑟夫·蒂索（Jozef Tiso）利用危機，強調斯洛伐克需要更大自主權以對抗外部威脅。

在 1939 年 3 月 14 日，第一斯洛伐克共和國的建立標誌著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政治勝利，但同時也開啟了其最具爭議的歷史篇章。第一斯洛伐克共和國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完全依賴德國，卻被 HSLŠ 宣傳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勝利（Lorman, 2019）。第一斯洛伐克共和國時期的政策實踐暴露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sup>3</sup>。一方面，蒂索政權試圖通過獨立強化斯洛伐克的文化和宗教認同，推行天主教保守主義政策，保護斯洛伐克語和傳統文化；然而，蒂索（Jozef Tiso）政權對納粹德國的依附和反猶政策嚴重損害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道德基礎（Lôňčíková, 2020）。1942 年開始的大規模驅逐猶太人行動，其中約 7 萬人被送往納粹集中營，使蒂索政權成為大屠殺的共謀，為戰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發展留下了道德污點（Hoensch, 1987）。1944 年斯洛伐克民族起義（Slovak National Uprising）的爆發展現了斯洛伐克社會的內在分裂。這場由反法西斯力量發起的起義反對蒂索政權和納粹控制，顯示了民族主義內部的分化：一部分人追求民主的民族自決，而非法西斯化的獨立<sup>4</sup>（Hudek, 2015: 4）。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但為戰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道德重建提供了歷史資源（Prečan, 2011）。

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建，伴隨著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系統性壓制。蒂索被處決，HSLŠ 被禁止，民族主義被共產主義政府打壓並視為「法西斯遺毒」（Naxera & Krčál, 2016）。然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未能完全消除斯洛伐克的民族意識，反而在某些方面為其潛在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1969 年聯邦制的實施是共產主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這一制度安排源於 1968 年布拉格之春運動，由斯洛伐克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領導，提出「有人性面貌的社會主義」。儘管改革被

<sup>3</sup> 斯洛伐克國政權內部也曾經發生過內鬥，保守派與激進派的鬥爭在 1942 年夏以保守派勝利告終，德國出於實用考慮支持了更受民眾歡迎的保守派（Lorman, 2019）。

<sup>4</sup> 起義展現了斯洛伐克社會的內在分裂：一部分人追求民主的民族自決，而非法西斯化的獨立。起義的政治目標是恢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這表明反法西斯力量對統一國家的支持（Hudek, 2015: 4）。

蘇聯鎮壓，但聯邦制的實施滿足了部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訴求，成立了捷克與斯洛伐克兩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有自己的議會與行政機構（Dubček, 1978: 420-23）。

共產主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潛在發展體現在多個領域。在文化領域，斯洛伐克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繼續在學校、出版和媒體中使用，斯洛伐克聯誼會於 1968 年後恢復運作<sup>5</sup>，出版斯洛伐克語文學、歷史與民俗研究（Koucký, 1990: 365-69; Hudek & Benko, 2024: 7-9）<sup>6</sup>。在經濟領域，共產政權大力投資斯洛伐克地區，使其人均收入達到捷克地區的 90%<sup>7</sup>，基本改變了經濟落後的地位（Wemer, 2013: 7）。然而，這種經濟發展也產生了新的矛盾：斯洛伐克人認為聯邦政府將污染環境的重工業引入斯洛伐克，而捷克人則認為政府用捷克人的力量補貼斯洛伐克（Chase, 1997: 15-18）。共產主義時期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最重要特徵是其隱性發展。表面上的意識形態統一掩蓋了深層的民族認同差異，這種差異在 1989 年天鵝絨革命後迅速政治化。聯邦制經驗為斯洛伐克人提供了自治管理的實踐，培養了本土政治精英，為後來的獨立運動奠定了基礎<sup>8</sup>（Ritter, 2012）。

1989 年天鵝絨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共產黨專政，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公開表達提供了政治空間。天鵝絨革命的爆發並非偶然事件，而是東歐劇變大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矛盾積累的結果（Wolchik, 1990）。在 1980 年代，蘇聯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為東歐國家的政治變革創造了國際條件。1989 年 11 月 17 日（國際學生日），布拉格超過十萬人的遊行活動成為革命

---

<sup>5</sup> 1954 年，共產主義政權出於政治原因，將斯洛伐克聯誼會轉變為國家組織，活動實際上僅限於國家圖書館、文學檔案和文學博物館等功能。然而，1968 年後，該組織恢復了會員制和地方俱樂部，並開始發展新的活動。

<sup>6</sup> 在 Simon Smith 研究中指出，斯洛伐克地方文化的認知仍受到共產主義時期官方與非官方、正式與非正式、傳統與另類領域之間劃分的影響（Smith, n.d.）。

<sup>7</sup> 斯洛伐克經濟研究院的資料顯示，1948 年斯洛伐克農業雇用了 60% 的工人，到 1980 年初這一比例降至約 18%。這種結構性變化反映了共產政權對斯洛伐克地區的大力投資，基本改變了其經濟落後地位（Research in Slovakia, n.d.）

<sup>8</sup> 1968 年聯邦化進程的學術研究證實了其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研究者指出創建兩個組成共和國（一個捷克，一個斯洛伐克）實現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化，是改革者的積極成就（Dubček, 1978）。

的導火線，防暴警察鎮壓學生示威引發了從 11 月 19 日到 12 月下旬的一系列示威抗議。天鵝絨革命的成功體現了其「天鵝絨」般的溫和特質。除了 11 月 17 日的衝突外，整個過程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也沒有人因此而喪生（Cox & Frankland, 1995: 75-78）。11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宣布放棄權力並取消一黨專政（Mikuš, 2021: 60-62）。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於 12 月 29 日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完成了政權的和平轉移。民主化進程釋放了長期被壓抑的民族情緒，使得各種政治力量得以公開競爭，斯洛伐克民族主義也因此獲得了新的政治機遇。

天鵝絨革命後，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復興呈現出幾個重要特徵。首先是政治化程度的顯著提升。各種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爾·梅恰爾（Vladimír Mečiar）領導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HZDS）<sup>9</sup>。梅恰爾成功地將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提出既要民主化又要民族獨立的雙重訴求<sup>10</sup>（Trantidis, 2021; Hilde, 1999）。

### 參、天鵝絨革命後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爭執

天鵝絨革命的成功雖然結束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但同時也開啟了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新一輪的政治競爭。民主化進程釋放了長期被壓抑的民族情緒和政治訴求，使得兩個民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得以公開化，最終導

<sup>9</sup> 在天鵝絨革命初期，斯洛伐克人建立公民論壇分支的可能性與建立公眾反暴力分支的可能性相等。公民論壇在斯洛伐克 38 個區中的 19 個區享有卓越地位，並在至少 8 個其他區存在。換句話說，OF 在斯洛伐克大約一半的領土上都是重要力量，遍佈斯洛伐克三個行政區域（東部、中部和西部斯洛伐克），甚至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本身也存在。公眾反暴力最終在斯洛伐克公民運動中取得霸權地位，是布拉迪斯拉瓦活動家與斯洛伐克其他地區同僚之間鬥爭的結果。這實際上是一場關於斯洛伐克適當政治組織的對立願景的鬥爭，對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聯邦中的未來具有關鍵意義（Krapfl, 2009）。

<sup>10</sup> 梅恰爾領軍的 HZDS，其意識形態被描述為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混合體，將戰前民族主義和戰後社會主義元素相結合。該黨在最後的捷克斯洛伐克歲月中推廣捷克和斯洛伐克平等夥伴關係的理念以及斯洛伐克政治自治。獨立後，它發展出一種族裔民族主義敘事，將斯洛伐克認同與匈牙利少數民族對立（Trantidis, 2021）。

致了聯邦的解體。天鵝絨革命的成功並未解決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根本性分歧。相反，民主化進程為這些分歧的公開表達提供了政治空間，使得潛在的民族矛盾迅速政治化（Nikodým, 2023）。革命期間，捷克地區的主導力量是「公民論壇」，斯洛伐克地區則是「公眾反暴力」組織，這種組織上的分化已經預示了後來政治發展的走向（Krapfl, 2009）。

1990 年的連字符戰爭（Hyphen War）雖然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但實際上揭示了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根本性分歧。天鵝絨革命後，聯邦名稱「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需要修改以反映民主化的成果，但關於新國名的討論卻引發了激烈爭論。斯洛伐克方面主張使用「Czecho-Slovakia」（帶連字符），強調兩民族的平等地位；捷克方面則傾向保留「Czechoslovakia」（無連字符），強調統一國家的概念<sup>11</sup>。這場爭議於 1990 年 3-4 月達到高峰，斯洛伐克議會與民族主義者強烈要求連字符名稱，認為無連字符抹殺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認同。捷克方面則反對連字符，認為其象徵著國家的分裂。爭議引發了布拉迪斯拉瓦與布拉格的抗議活動，顯示了民眾對這一看似技術性問題的高度關注。最終，1990 年 4 月 20 日，聯邦議會通過了「捷克與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作為妥協方案，既避免了連字符，又明確提及了兩個民族（Krapfl, 2009）。

連字符戰爭的深層意涵在於它反映了兩個民族對國家性質的不同理解。對於斯洛伐克人而言，連字符代表著平等和尊嚴，是對其民族地位的承認；對於捷克人而言，連字符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分裂和統一性的喪失。這種認知差異為後來更嚴重的政治衝突埋下了伏筆。

連字符戰爭之後，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擴展到聯邦結構和權力分配問題上。斯洛伐克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傾向於建立鬆散的邦聯制；捷克則支持強聯邦制，強調中央政府的權威。這種結構性分歧反映了兩個民族對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不同理解。1990 年的權力分配談判顯示了雙

<sup>11</sup> 奧地利科學院的研究詳細記錄了這場爭議的過程。在 1990 年 1 月 23 日，哈維爾總統在聯邦議會建議從國名中省略社會主義一詞，這在斯洛伐克引起公眾騷動。斯洛伐克拒絕接受任何類似於第一共和國統一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概念的名稱。經過戲劇性談判後，連字符戰爭成為關於愛國主義、認同和明顯民族主義衝突的開端（Suk, 1990）。

方立場的不可調和性。斯洛伐克要求聯邦議會授予地方更多的財政與立法權，希望在稅收、預算、外交等關鍵領域獲得更大的決策權。捷克方面則擔心過度的權力分散會導致聯邦的解體，堅持維持中央政府在重要事務上的主導地位（Rychlik, 2018）。

1991 年的米蘭諾維采會談（Milanovice Talks）是解決聯邦結構爭議的重要嘗試。聯邦政府試圖通過憲法改革明確捷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權限，但斯洛伐克代表堅持邦聯模式，要求各共和國享有更大的主權，包括擁有自己的憲法、法律體系和國際法律主體資格。捷克代表則拒絕了這種要求，認為邦聯制實際上等同於國家的分裂。談判的失敗標誌著通過憲法途徑解決爭議的努力告一段落（Stein, 1992）。聯邦結構的爭執成為分離的核心驅動因素，因為它涉及到國家主權的根本問題。斯洛伐克認為只有通過邦聯制或獨立才能保障其平等地位和民族尊嚴，而捷克則認為維持強聯邦制是保障國家統一和有效治理的必要條件。

經濟轉型政策的分歧加劇捷克與斯洛伐克之間的政治矛盾。1989 年後，捷克斯洛伐克開始推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兩個地區對改革速度和方式存在根本性分歧。捷克主張快速私有化與激進的經濟自由化，認為只有通過「休克療法」才能快速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也符合當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流觀點。捷克的工業基礎相對發達，具備承受激進改革衝擊的條件，但斯洛伐克方面則要求採取漸進的改革策略，主張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政策。這種立場反映了斯洛伐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該地區以重工業和農業為主，國有企業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快速私有化可能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社會動盪。斯洛伐克領導人擔心激進改革會損害該地區的經濟利益，加劇與捷克地區的發展差距<sup>12</sup>（Gould & Szomolányi, 2000: 63-65）。

<sup>12</sup> 美國國務院的分析指出，在 1992 年，兩位主要當選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勞斯（代表捷克人）和弗拉基米爾·梅恰爾（代表斯洛伐克人）會面試圖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未來的形態達成妥協。克勞斯是一位經濟學家，對他來說在共產主義嚴格規則後自由化捷克斯洛伐克經濟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梅恰爾反對這種向自由市場的快速轉變（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1990-91 年的經濟計劃爭議集中體現了這種分歧。聯邦政府的私有化計劃優先支持捷克的工業部門，而斯洛伐克的國有企業面臨裁員與關閉的風險。大型軍工企業的命運成為爭論的焦點：這些企業主要位於斯洛伐克，在冷戰結束後面臨需求驟減困境，但它們同時也是當地就業的重要支撐<sup>13</sup>。1992 年選舉前的經濟政策辯論進一步激化了矛盾。斯洛伐克要求聯邦政府提供更多補貼支持地方工業，建立就業保護機制，並在對外貿易政策上給予特殊考慮。捷克方面則認為這種要求會拖累整體經濟改革的進程，損害國家的國際競爭力（Innes, 1997）。經濟分歧的政治化過程表明，看似技術性的政策爭議往往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對於斯洛伐克而言，經濟政策的分歧不僅關係到物質利益，更關係到民族尊嚴和政治地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將經濟不平等問題政治化，將其描述為捷克對斯洛伐克的「經濟殖民」，為分離主義訴求提供了經濟合理性。

1992 年 6 月的聯邦選舉成為捷克與斯洛伐克政治分化的決定性時刻。選舉結果清晰地反映了兩個地區民眾對國家未來的不同期待，也為後來的分離談判奠定了政治基礎。在捷克地區，瓦茨拉夫·克勞斯（Václav Klaus）領導的公民民主黨（ODS）獲得勝利。克勞斯是堅定的自由市場經濟支持者，主張快速推進經濟改革和私有化進程。在聯邦問題上，ODS 支持強聯邦制，反對過度的權力分散，認為只有在統一的政治框架下才能有效推進經濟轉型。但在斯洛伐克地區，弗拉基米爾·梅恰爾領導的民主斯洛伐克運動（HZDS）成為最大的政治力量<sup>14</sup>。梅恰爾的政治立場結合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元素，主張更加漸進的經濟改革策略，強調保護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和社會穩定。在聯邦問題上，HZDS 要求更大的自治權，甚至不排除獨立的可能性。

<sup>13</sup> 由於捷克和斯洛伐克經濟結構的差異，共產主義後的經濟改革對斯洛伐克經濟的打擊比對捷克更嚴重。斯洛伐克對激進改革的政治反對與捷克地區對改革的廣泛支持形成對比（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sup>14</sup> HZDS 的支持在既受改革威脅的人群（最低學歷和高中教育人口）中最強，也在高素質專家中獲得超過 50% 的支持。這指向技術精英或灰色地帶構成了重要的支持基礎（Innes, 1997）。

選舉結果的對比性揭示了兩個地區政治偏好的根本性差異。捷克選民更關注經濟效率和快速融入西方，願意接受改革的短期成本以換取長期利益；斯洛伐克選民則更重視社會穩定和民族尊嚴，對激進改革持懷疑態度。這種偏好差異反映了兩個地區不同的歷史經驗、經濟結構和文化傳統。選舉後的政府組建過程進一步暴露了政治分歧的嚴重性（Cox & Frankland, 1995）。克勞斯與梅恰爾在經濟政策、聯邦結構、外交取向等關鍵問題上存在根本性分歧，無法形成有效的執政聯盟。這種政治僵局使得聯邦政府無法正常運作，也為分離談判創造了客觀條件（Bunce, 1999: 220-22）。

1992年7月17日，斯洛伐克議會通過『斯洛伐克民族主權宣言』，標誌著分離進程的正式啟動。這一宣言不僅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政治化的高峰，也是聯邦解體的重要催化劑。『主權宣言』的核心內容包括：宣示斯洛伐克民族的主權地位，強調斯洛伐克人民擁有決定自己政治前途的不可剝奪權利；要求建立獨立的斯洛伐克國家，或者在邦聯框架下享有完全的自治權；拒絕任何形式的中央集權統治，堅持斯洛伐克的國際法律主體資格（Innes, 1997）。宣言的通過引發了捷克方面的強烈反應。捷克政治領袖將其視為對聯邦統一的直接挑戰，認為斯洛伐克正在單方面改變遊戲規則。聯邦議會內部出現激烈爭論，捷克代表指責斯洛伐克破壞憲法秩序，而斯洛伐克代表則堅持這是行使民族自決權的正當行為。聯邦總統哈維爾對『主權宣言』表示強烈反對，認為這違背了天鵝絨革命的初衷，破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團結<sup>15</sup>。作為捷克斯洛伐克統一的象徵性人物，哈維爾的立場反映了相當一部分民眾對分離的擔憂。然而，政治現實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個人意願的控制範圍。

『主權宣言』的通過標誌著政治危機的全面升級。此時，通過政治妥協維持聯邦統一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分離談判成為唯一現實的選擇。宣言為梅恰爾與克勞斯的後續談判提供了明確的政治授權，也為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sup>15</sup> 哈維爾宣布辭職，表示宣言不清楚作為實際問題意味著什麼，但標誌著國家解體幾乎確定（Czech Radio, 1992）。

## 肆、天鵝絨分離的談判過程與和平機制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實現不僅需要分離的政治意願，更透過精心設計的談判機制和務實的政治領導。1992 年夏季開始的分離談判展現了現代民主政治在處理複雜民族衝突時的制度化能力，其和平性質與同期其他國家解體的暴力衝突形成了鮮明對比。雙方領導人都意識到維持現狀的不可持續性，但同時也認識到暴力衝突的巨大成本。這種理性計算為和平談判創造了基礎條件。克勞斯後來回憶說，他認為分離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任務是使分離過程友好、和平且公平。談判的階段性特徵反映了複雜政治問題的漸進性解決過程。初期階段（1992 年 6-7 月）主要是探索性談判，雙方試圖尋找維持聯邦的可能性；中期階段（1992 年 7-8 月）是關鍵性決策階段，雙方逐漸接受分離的現實；後期階段（1992 年 8-12 月）是技術性談判階段，重點是具體的分離條款和執行機制。

1992 年 7 月 23 日的布拉迪斯拉瓦會談是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轉捩點。這次會議在斯洛伐克議會通過《主權宣言》六天後舉行，會談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克勞斯與梅恰爾在會談中進行了坦誠的交流，最終達成了分離的政治共識。會談的核心爭議圍繞著國家的未來結構展開。梅恰爾堅持斯洛伐克應該獲得「國際法律主體性」和完全的主權，這與維持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存續根本不相容。克勞斯則明確表示，如果無法維持強有力的聯邦制，他寧願選擇分離也不接受鬆散的邦聯模式。這種立場的對立實際上簡化了談判的複雜性。與其在邦聯與聯邦之間進行複雜的制度設計，不如直接選擇分離這一清晰的解決方案。這種「簡化」體現了政治領袖的務實智慧：在面對無法調和的根本性分歧時，清晰的分離可能比模糊的統一更有利於雙方的長遠利益（Rychlík, 2018）。布拉迪斯拉瓦會談的成功還歸因於雙方領導人的個人品格和政治風格。克勞斯和梅恰爾都是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具有超越意識形態偏見的務實態度。他們能夠將個人情感與政治理性相分離，專注於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在 1992 年 8 月 26 日，克勞斯和梅恰爾在布爾諾的維拉圖根哈特（Villa

Tugendhat)舉行了決定性的閉門會議<sup>16</sup>。維拉圖根哈特談判的秘密性質體現了政治決策的複雜性。雖然分離的政治意願已經明確，但具體的執行細節需要在相對保密的環境中進行討論。這種秘密談判避免了過早的公眾干預和媒體炒作，為達成協議創造了有利條件。談判過程展現了雙方的務實態度。正如社會學家米洛斯拉夫·巴赫納 (Miloslav Bahna) 指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無法就如何進行市場轉型達成一致。捷克的觀點是：越快越好。而斯洛伐克的觀點更加謹慎，偏好較慢的方法」。這種根本性分歧，使得分離成為避免長期政治僵局的理性選擇 (Czech Radio, 2022)。維拉圖根哈特協議涵蓋了分離的主要原則和框架，為後續的技術性談判奠定了基礎。協議的核心內容包括：確認分離的政治決定，時間表設定為 1993 年 1 月 1 日；建立分離執行委員會，負責處理具體的技術問題；承諾維持友好關係，避免任何形式的敵對行為。

分離過程的合法性和有序性需要通過正式的法律程序來保障。聯邦議會通過了兩項關鍵的憲法法案，為分離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憲法法案 541 號』(1992) 主要處理聯邦財產的分割問題。該法案規定聯邦財產按捷克與斯洛伐克人口比例 (約 2:1) 分割，涵蓋軍事裝備、國有企業、鐵路、航空基礎設施等各類國家資產。這種基於人口比例的分配原則體現了公平性考慮，避免了複雜的估值爭議<sup>17</sup>。『憲法法案 542 號』(1992) 正式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於 1992 年 12 月 31 日解體的法律事實，明確規定分裂後將形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兩個繼承國家。該法案還規定了過渡期的行政安排，確保政府職能的連續性。法律框架的建立過程體現了現代民主國家處理重大政治變革的制度化能力。通過正式的立法程序，分離獲得了憲法層面的合法性，避免了可能出現的法律爭議。這種制度化取向與其他

<sup>16</sup> 布爾諾位於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發之間，維拉圖根哈特當時是政府建築物，這個地理位置具有象徵性意義。談判的秘密性質體現了政治決策的複雜性，避免了過早的公眾干預和媒體炒作 (Villa Tugendhat Archives, 2022)。

<sup>17</sup> 在協議之後數年的時間裡，經過捷克與斯洛伐克雙方不同程度的成功努力，大約有 95% 的聯邦財產分配完畢。但到 1998 年梅恰爾第三屆政府結束時，仍有爭議的 5% 未得到解決，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直到 1999 年 (正式在 2000 年初)，拖延的談判才結束 (Schmögnerová, 2020)。

國家解體過程中的法律混亂形成了鮮明對比（Erdősová, 2022）。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不僅在於政治決策的智慧，更在於技術執行的精細。分離協議涵蓋了國家解體的所有重要方面，其詳細程度和執行效率為國際政治學提供了寶貴的案例研究材料。財產分割是分離協議中最複雜的部分。按照 2:1 的基本比例，聯邦的所有物質資產都需要進行分配，包括：軍事裝備的分配考慮了地理位置和戰略需求，大部分位於斯洛伐克境內的軍事基地歸斯洛伐克管理；政府辦公設備、檔案資料按照相關性原則分配，與斯洛伐克歷史相關的檔案歸斯洛伐克保管；交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的維護責任按地理邊界劃分（Fidrmuc, et al., 1999）。布拉格儲存的聯邦黃金儲備等特殊資產的分配引發了一些爭議<sup>18</sup>，這些問題在分離後數年才最終解決，但並未影響整體的分離進程。貨幣安排經歷了從统一到分離的轉變過程。最初的計劃是保留共同貨幣（捷克斯洛伐克克朗），以減少分離的經濟成本。然而，由於捷克方面擔心可能出現的經濟損失和通脹風險，兩國於 1993 年 2 月 8 日分別發行獨立貨幣。捷克在 1992 年秘密準備了貨幣分割的技術方案，確保了快速而順利的過渡（World Bank, 1994: 20-23）<sup>19</sup>。

邊界與公民權問題的處理體現了人道主義考慮。國界沿用原有的捷克斯洛伐克行政分界線，避免了複雜的領土爭議。公民可以自由選擇捷克或斯洛伐克國籍，大多數人選擇了與其居住地相對應的國籍（Sardelić, 2015）。但是，羅姆人（吉普賽人）由於登記問題面臨了一定的公民權爭議<sup>20</sup>，這一問題在後續幾年中逐步得到解決（Bakker, 1999）。國際條約與外交資產的處理展現了國際法的複雜性。聯邦簽署的國際條約需要由兩國共同繼承或重

<sup>18</sup> 1993 年 2 月，捷克政府要求斯洛伐克政府支付 247 億克朗，作為捷克共和國在聯邦時期為斯洛伐克共和國進行投資和技術轉讓的補償。斯洛伐克政府回應要求支付 170 億美元，作為二戰期間捷克共和國從斯洛伐克拿走的黃金儲備的補償。這相當於捷克共和國 GDP 的 80%（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sup>19</sup> 起初，斯洛伐克與捷克的貨幣具有相等的匯率，但後來大部分時間斯洛伐克克朗的價值都低於捷克克朗（World Bank, 1994）。

<sup>20</sup> 『公民權法』因阻止與捷克共和國有實際聯繫的羅姆人（如長期居住、工作和家庭關係）申請捷克公民權而備受批評。雖然到 1993 年大多數居住在捷克共和國的羅姆人從未在斯洛伐克生活過，但必須申請捷克公民權。為此，他們必須滿足以下標準：解體時在捷克共和國擁有永久居留權、前五年無犯罪記錄以及精通捷克語（Sardelić, 2015）。

新談判，這個過程涉及數百項雙邊和多邊協議。外交資產按照協議進行分割，捷克繼承了大部分現有的使館和領事館，斯洛伐克則需要新建外交網絡。這種安排雖然在短期內給斯洛伐克造成了一定困難，但從長遠來看有利於其獨立外交政策的建立。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為國際政治學提供了研究和解決民族衝突的寶貴案例。1989年的非暴力革命確立了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政治分歧的傳統，這種政治文化在分離談判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政治領袖和民眾都傾向於選擇和平的解決方式，而非暴力對抗（Bunce, 1999）。天鵝絨分離過程中一個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是民意與政治精英決策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揭示了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議制的複雜性，以及政治領袖在處理複雜問題時的相對自主性（Jefferson, 1994: 330-32）。民調數據顯示，分離主要由政治精英主導，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1992年9月的民調顯示，僅36%的捷克人和37%的斯洛伐克人支持分離。這一數據表明，大多數民眾並不熱衷於國家的分裂，更傾向於維持某種形式的統一<sup>21</sup>（Sardelić, 2015）。兩國領導人都拒絕舉行關於分離問題的全民公投，這一決定引發了一定的爭議。支持者認為，全民公投可能會阻礙必要的政治決策，因為民眾往往缺乏對複雜政治問題的深入理解；反對者則認為，如此重大的政治決策應該由民眾直接決定，政治精英無權代替人民做出選擇<sup>22</sup>（Hanley, 2004）。

這種民意與政治決策的落差反映了代議制民主的內在張力。政治領袖既要回應民眾的意願，又要具備超越短期民意的戰略眼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中，政治精英認為分離是避免長期政治僵局的必要選擇，即使這一選擇在短期內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Trabucco, 2020: 633-35）<sup>23</sup>。事後的

<sup>21</sup> 公眾輿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兩個部分都不支持分裂。如果就此問題舉行公投，最可能的結果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選民都會投票反對分裂（Czech Radio, 2022）。

<sup>22</sup> 根據媒體報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對分離實施方式評價不高，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分離過程中沒有發言權。大多數公眾輿論在1992年和現在都說公投是必要的（Heijmans, 2017）。

<sup>23</sup> 研究指出，捷克政治精英支持傳統的解決公共事務方式，不偏好在公投中諮詢公眾意見。因為普遍的意見是，捷克公民在過去100年中只經歷了30年的民主，他們對自己直接表達意見的能力缺乏信任（Trabucco, 2020: 633-35）。

發展證明了政治精英判斷的正確性。分離後兩國都實現了穩定的政治發展和經濟增長，民眾對分離的支持率也逐步上升。這一經驗表明，在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時，政治領袖的戰略眼光有時比短期的民意更為重要（Szomolányi, 2004: 149）。

正如 Basta 與 Bustikova（2016）所指出的，「分割國家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因為它被阻塞了，它正在自行瓦解。如果我們不僅將國家視為法律主體，而是將其視為功能結構，那麼我們必須意識到，國家在 1992 年正在逐漸消失。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這種功能主義的分析視角揭示了政治制度的動態性質：當一個政治體系無法有效運作時，其形式上的存續可能掩蓋實質上的解體。

## 伍、天鵝絨分離後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

天鵝絨分離不僅是中歐政治版圖的重新繪製，更是兩個新興民主國家重塑國際身份、融入國際體系的歷史進程。分離後的 30 多年來，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走出了既有共同點又各具特色的國際發展道路。天鵝絨分離雖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完成，但分離本身並非毫無代價。事實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給兩國，尤其是斯洛伐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挑戰。這些挑戰在分離後的最初數年間尤為明顯，包括經濟衰退與失業危機、少數民族權利受損，以及民主制度的倒退風險。

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裂為兩個主權國家，這一歷史性時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迅速認可。兩國於 1993 年 1 月加入聯合國，標誌著它們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正式亮相。這種快速的國際認可反映了冷戰後國際體系對國家分離相對寬鬆的態度，也體現了天鵝絨分離和平性質的國際價值。分離後過渡安排的順利進行展現了兩國政治精英的務實精神。雙方簽署了一系列雙邊協議，確保貿易、邊界管理與公民權利的連續性。這些協議涵蓋了從海關合作到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為兩國關係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礎。外交資產的分割雖然在技術上複雜，但整體過程相對平順，避免了可能出現的外交糾紛。

天鵝絨分離雖然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實施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遺留問題。這些爭議的處理方式和解決機制為理解兩國關係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視角。其中加布奇科沃-納吉馬羅什水壩（Gabcikovo-Nagymaros Dam）爭議是分離後最複雜的遺留問題之一。這個多瑙河上的水電項目始於 1977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聯合協議，分離後由斯洛伐克繼承，成為與匈牙利的雙邊糾紛，但也間接影響了捷克-斯洛伐克關係<sup>24</sup>（Deets, 2009）。斯洛伐克於 1992 年單方面啟動水電站運營，引發了環境和國際法爭議。捷克雖然不是直接當事方，但在財務責任和多瑙河水權問題上與斯洛伐克存在分歧。1997 年國際法院的裁決確認了原有協議的有效性，匈牙利無權單方面終止協議，但斯洛伐克也不能單獨運營加布奇科沃<sup>25</sup>（Deets, 2011）。捷克的財務責任通過雙邊協商得到解決，這一經驗表明，技術性爭議可以通過法律途徑和外交談判得到妥善處理。

財產分割的後續爭議主要涉及聯邦資產的具體估值和分配。雖然 2:1 的基本比例已經確定，但部分資產（如黃金儲備、國有企業股權）的具體分割在執行過程中產生了爭議。斯洛伐克認為自己在某些高價值資產的分配中處於劣勢，要求額外補償。1994 年雙方簽署的補充協議通過捷克支付約 5 億美元補償金的方式解決了大部分爭議（Capek & Sazama, 1993: 215-18）。這種務實的解決方案避免了長期的法律糾紛，也為兩國關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邊境管理與人員流動問題在歐盟一體化進程中逐步得到解決。分離初期，兩國需要建立邊境檢查制度，處理跨境人員流動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羅姆人的跨境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分離時，許多羅姆人面臨複雜的身份問題。在聯邦時期，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僅具有行政意義，羅姆人可以自

<sup>24</sup> 1977 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同意在多瑙河上建設大壩綜合體，分離後這一爭議由斯洛伐克繼承。學術研究顯示，該爭議的象徵意義極其重要：對斯洛伐克而言，大壩代表著斯洛伐克民族在現代世界的重要成就；對匈牙利而言，大壩與共產主義的失敗聯繫在一起（Deegan-Krause, 2006）。

<sup>25</sup> 法院基本上裁定：匈牙利無權單方面廢除 1977 年協議；雙方都可以要求對彼此的失敗造成的損害進行相互賠償；匈牙利有權共同控制現有系統並平等分享能源，但只有在首先支付其對原投資的貢獻（即 50% 的成本）後才能實現這種權利要求（Deets, 2011）。

由遷徙和定居。但分離後，原本的行政邊界轉化為國際邊界，羅姆人的身份歸屬成為政治問題。許多居住在捷克的羅姆人在行政記錄上被標註為「斯洛伐克共和國公民」，儘管他們在捷克生活了數十年甚至終生；這種行政劃分在聯邦時期無關緊要，但在分離後卻成為決定公民身份的關鍵因素。1992 年 12 月 29 日，捷克議會以 155 票贊成、13 票反對通過了『公民權法』(Act No. 40/1992)，該法律規定，只有滿足以下條件的人才能自動獲得捷克公民身份：(一) 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擁有捷克共和國的共和國公民身份（在聯邦框架內的行政身份）。(二) 在捷克境內擁有登記的永久居住地。(三) 擁有五年無犯罪記錄 (Sobotka, 2007)。第三項要求成為羅姆人獲得公民身份的主要障礙。由於羅姆人群體普遍面臨經濟困難、教育水平較低、社會邊緣化等問題，他們的犯罪率相對較高（主要是輕微犯罪如盜竊、違反公共秩序等）。這一「無犯罪記錄」要求被廣泛認為是針對羅姆人的歧視性條款 (ERRC, 2000; Sobotka, 2007)。

更為嚴重的是，根據議會記錄，該法律的設計初衷即是將羅姆人從捷克轉移到斯洛伐克。1992 年 7 月的一份政府文件明確指出：「這一過程（分離後建立捷克公民身份）應被用來……將羅姆民族的公民轉移到斯洛伐克」（Sobotka, 2007: 49）。這表明該法律具有明確的種族歧視意圖。但斯洛伐克的梅恰爾政府，對少數民族尤其是匈牙利少數民族和羅姆人一樣實施了邊緣化政策。匈牙利語在公共場所和教育系統中的使用受到限制 (Deegan-Krause, 2006)。羅姆人則繼續遭受系統性歧視，無法獲得公民身份、就業和教育機會。

由於無法滿足『公民權法』的要求，成千上萬的羅姆人陷入了無國籍或半無國籍狀態。他們既不是捷克公民，也往往無法獲得斯洛伐克公民身份（因為他們在斯洛伐克沒有永久居住記錄）(ERRC, 2000)。這一狀態帶來了嚴重的實際後果，沒有公民身份的羅姆人無法合法工作，企業拒絕聘用身份不確定的求職者 (HRW, 1997)。無國籍羅姆人無法領取失業救濟、兒童補助、養老金等社會福利，尤其女性羅姆人更面臨「雙重邊緣化」的風險 (Piscová, 2006)。而且沒有公民身份意味著無法投票或參選，羅姆人失去了政治發聲的渠道 (HRW, 1997)。教育與住房限制：羅姆兒童入學受限，

成年人無法租賃或購買房產 (UNICEF, 1995)。此外，地方政府官員利用分離的機會，將羅姆居民驅逐出公共住房。1992 年 12 月，捷克總檢察長甚至向議會提交了一份『特別措施法』草案，旨在「以專業方式解決某些無法正常行為的居民群體的問題」，這一措辭被廣泛理解為針對羅姆人 (Sobotka, 2007)。

公民權法立即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批評。歐洲羅姆人權中心 (ERRC)、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等組織多次譴責捷克的政策 (Struhárová, 1999)。在國際壓力下，捷克政府於 1995 年修訂了『公民權法』，為所謂的「自由捷克人」(來自烏克蘭的捷克族裔) 提供了優惠待遇。1996 年 5 月，議會再次修訂法律，允許內政部在特定情況下忽略「無犯罪記錄」的要求 (ERRC, 2000)。但這些修訂的實際效果有限，因為它們仍然要求申請人證明「家庭、社會和勞動背景」(*zázemí*) 以及持有長期居住許可 (ERRC, 2000)。羅姆人問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分離後最嚴重的人權遺留問題之一。歐盟委員會在 2000 年代的多份國家報告中持續批評捷克和斯洛伐克對羅姆人的邊緣化政策，認為這違反了歐盟的人權標準 (Kochenov, 2010)。羅姆人問題至今仍是兩國面臨的主要社會挑戰之一。但隨著 2004 年兩國加入歐盟、2007 年成為申根區成員，邊境檢查被取消，人員自由流動得到保障 (Fiałkowska, et al., 2024: 463-65)，但羅姆人的流動問題獲得解決，人權保障卻進展有限。

捷克共和國在分離後迅速展現了融入西方體系的決心和能力。<sup>26</sup>憑藉其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布拉格的國際地位以及瓦茨拉夫·克勞斯政府的快速市場化改革，捷克成功地將自己定位為中歐民主與經濟改革的典範 (Machonin, et al., 2006)。快速的西方整合進程體現了捷克的戰略眼光。在安全領域，捷克於 1999 年成為第一批加入北約的前華沙公約國家之一，與波蘭和匈牙利一同實現了歷史性的軍事聯盟轉換。這一成就不僅標誌著捷

<sup>26</sup> 捷克於 1999 年加入北約、2004 年加入歐盟的過程。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共和國被接納為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成員，1995 年開始與北約的正式對話。但與捷克、匈牙利和波蘭於 1996 年加入經合組織、1999 年加入北約不同，斯洛伐克僅在 2000 年成為經合組織成員，北約和歐盟加入時間均晚於其他維謝格拉德國家 (Halás, 2014)。

克在安全領域完全融入西方體系，更象徵著其從冷戰時期東方陣營向西方民主陣營的根本轉變。

在經濟整合方面，捷克於 2004 年 5 月正式加入歐盟，成為歐盟第五次擴大的重要成員。加入歐盟不僅提升了捷克的國際地位，也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和資源。歐盟成員資格使捷克能夠參與歐洲單一市場，獲得結構基金支持，並在歐洲政治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經濟發展的成功軌跡鞏固了捷克的國際聲譽（Kundu, 2024）。分離後，捷克充分利用其工業化優勢，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布拉格逐漸發展為中歐重要的金融和商業中心，其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指標上，更體現在國際機構和跨國公司的區域布局中。捷克的成功轉型經驗成為其他轉型國家學習的對象（Halás, 2014）。中歐地區領導角色的確立是捷克國際地位提升的重要體現。在維謝格拉德集團（V4）中，捷克經常扮演重要的協調者角色，憑藉其穩定的政治制度、相對發達的經濟以及成功的民主轉型經驗，在中歐區域合作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Tůma, 2006: 5-7）。

斯洛伐克的國際地位提升經歷了更為複雜和曲折的過程，其發展軌跡充分體現了小國外交在內政與外交互動中的複雜性。分離後初期（1993-98），由於弗拉基米爾·梅恰爾政府的威權傾向，斯洛伐克面臨了相當程度的國際孤立。初期國際孤立的深層原因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民主價值的重視（Bakker 1998: 25-27）。梅恰爾政府的民族主義政策、對媒體自由的限制以及對少數民族權利的忽視（Bacisin, 1999），引起了歐盟與北約的嚴重關切（McAdams, 1997），<sup>27</sup>這一時期使斯洛伐克在國際上陷入孤立，並險些滑向專制軌道（*New York Times*, 1997）。

梅恰爾政府對媒體實施了系統性控制。國營電視台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獨立媒體則遭到廣告封殺和行政騷擾（Wemer, 2013）。調查性記者面臨威脅和恐嚇，批評政府的媒體機構受到稅務審查和執照吊銷的威脅（Bacisin, 1999）。1998 年選舉前，政府通過了選舉法修正案，規定在 30

<sup>27</sup> 1997 年，歐盟和北約都以純粹的政治理由拒絕了斯洛伐克的成員資格申請。自由之家當年的評分與俄羅斯、馬其頓和摩爾多瓦處於同一水平（3.80）（Szomolányi, 2004）。

天的正式競選期間，只有國營媒體可以播出與政治競選相關的活動。這一規定迫使私營電視台 TV Markiza 取消了其「領導人」節目，以避免罰款和失去營業執照 (Trantidis, 2022)。這種做法嚴重限制了公眾獲取多元政治信息的權利。

梅恰爾執政期間，政府系統性地侵蝕司法獨立。高等法院的法官被更換，法院的獨立性遭到嚴重侵蝕 (Wemer, 2013)。政府利用控制下的檢察系統來掩蓋或縱容政府官員的違法行為，當檢察官或法官試圖追究政府的責任時，他們面臨政治壓力甚至職業威脅 (Deegan-Krause, 2006)。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 1995 年總統科瓦奇 (Michal Kováč) 之子在奧地利被綁架事件。據報導，這次綁架是由斯洛伐克情報機構策劃的，目的是報復科瓦奇總統對梅恰爾的政治批評，一名向媒體洩密的情報官員隨後遭到汽車炸彈襲擊 (Wemer, 2013)。這些事件顯示了梅恰爾政府的殘暴手段。

歐盟等國際組織對斯洛伐克的民主進程表示擔憂，暫緩了斯洛伐克的加入談判。國際社會的這種反應表明，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整合不僅要求經濟改革，更要求政治民主化 (Szomolányi, 2004: 149-51)。梅恰爾時期的政策實踐暴露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民族主義政策滿足了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情感需求，鞏固了斯洛伐克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過度的民族主義導致了國際孤立，損害了國家的長遠利益。這種矛盾最終促成了政治變革的需求 (Halás, 2014)。1998 年選舉的成功舉行和梅恰爾的敗選，證明了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韌性 (Naegele, 1998)。儘管政府試圖操縱選舉法和媒體環境，但高投票率 (84.25%) 和反對派的團結最終確保了政權更替 (Abrahám, 2002: paras. 12-15)。這為其他轉型國家提供了希望：即使在威權威脅下，民主機制仍有可能發揮作用。

1998 年後的政治轉向與國際復歸，標誌著斯洛伐克發展道路的重要轉折。新政府積極推動民主化改革、改善人權狀況，並致力融入歐洲-大西洋結構 (RFE/RL, 1998)。此政策轉向不僅反映了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也體現國際壓力的有效性 (Pridham, 2002: 80)。斯洛伐克在 2004 年同時加入北約和歐盟，對該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McAdams, 1997)。與捷克相比，斯洛伐克的加入進程更加曲折，但最終的成功證明了該國能夠克服初期的

挑戰，達到歐洲標準<sup>28</sup>（Mesežnikov, 2004）。這種「遲來的成功」反映了國際整合的複雜性：政治民主化往往比經濟改革更為困難，但也更為根本。

經濟轉型的後發優勢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政治發展的不足。分離後的斯洛伐克經歷了嚴峻的經濟轉型陣痛。雖然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在 1989 年後已開始市場化改革，但分離本身加劇了斯洛伐克的經濟脆弱性，導致物價上漲、失業率飆升、產業衰退等多重困境（UNECE, 1999）。斯洛伐克的失業問題在分離後迅速惡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資料，1990 年至 1993 年間，斯洛伐克的就業人數下降了 30 萬人，主要原因包括經濟重組、企業倒閉和大規模裁員（Bůček, 2010）；同時，勞動力人口增加了 3 萬人，導致 1993 年底失業人數達到 33 萬人，失業率高達約 14%（Pani, 2000）。這一數字在隨後幾年保持在 12-13% 的高位，直到 1997 年後再次攀升，於 2000 年初達到 19.5% 的峰值（Pani, 2000）。相較之下，捷克共和國的失業問題則相對溫和。OECD（1994）的經濟調查顯示，捷克在 1990 年代前半期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 4-5% 左右，遠低於斯洛伐克。這種差異反映了兩國經濟結構的根本不同：捷克擁有更多元化的產業基礎和更靈活的勞動市場，而斯洛伐克則高度依賴重工業和軍工企業，這些部門在轉型期間受到嚴重衝擊。

斯洛伐克的工業生產在轉型初期大幅萎縮。OECD 的資料顯示，1991 年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的工業生產下降至 1990 年水準的 76.9%（Capek & Sazama, 1993）。分離後，斯洛伐克的情況更為嚴峻。1990-93 年間，斯洛伐克的就業下降主要集中在製造業和重工業部門（Pani, 2000）。從 GDP 角度來看，斯洛伐克的經濟復甦明顯滯後於捷克（UNECE, 1999）。雖然兩國在 1993 年分離時的人均 GDP 差距相對較小（捷克約為 110，斯洛伐克約為 100，以指數計算），但隨後幾年這一差距逐漸擴大（EC, 2017）。直到 1999 年，斯洛伐克的經濟表現才首次達到並略微超過轉型前的水平（Wemer,

---

<sup>28</sup> 斯洛伐克的第二階段民主轉型（1998-2002）與國際認可密切相關。1999 年 12 月赫爾辛基峰會邀請斯洛伐克開始加入談判，標誌著其國際地位的根本性轉變（Mesežnikov, 2004）。

2013)。相比之下，捷克的復甦速度更快，在 1990 年代中期即已回到轉型前的經濟水平。

經濟困境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造成了深遠影響。貧困率在 1989-1994 年間增加了 5 個百分點，遠高於捷克的 1.2 個百分點增幅（UNICEF, 1995; Velkova, 2013）。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中產階級也面臨購買力下降的壓力。這種社會不滿為 1998 年政權更替奠定了基礎，也反映了民眾對梅恰爾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望。雖然起步較晚，但斯洛伐克在 2000 年代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布拉迪斯拉瓦發展為新興的金融中心，該國也成功吸引了汽車製造業等外國投資（Havlat et al., 2018）。斯洛伐克的經濟表現證明了其具備融入歐洲經濟體系的能力<sup>29</sup>。

維謝格拉德集團（V4）在兩國分離後關係維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個區域合作機制不僅為捷克與斯洛伐克提供了多邊對話平台，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整個中歐地區的一體化進程。V4 的歷史演進與制度化發展體現了中歐區域合作的漸進性質。該組織於 1991 年 2 月 15 日成立，最初成員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1993 年捷克斯洛伐克分離後，捷克與斯洛伐克作為獨立國家延續了合作框架（Visegrad Group, 2011）。V4 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成員國的共同利益，增強中歐在歐洲和全球舞台的影響力。

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 V4）的名稱源自 1335 年四國國王在匈牙利維謝格拉德堡的會晤。V4 集團建立於冷戰剛剛結束、東歐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時代。四國共同的目標是：（1）加強相互間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建設的協調；（2）共同爭取加入北約與歐盟；（3）在區域事務中進行政治協調與合作。在 1990 年代，V4 集團成為中歐地區最重要的區域組織，對四國的民主化與西方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捷克與斯洛伐克在 V4 框架內的合作體現了分離後相互尊重與友好關係的持續。分離後的十多年間，

<sup>29</sup> 斯洛伐克 2004 年的稅收和福利改革轉變了投資環境，包括引入 19% 的個人所得稅統一稅率、19% 的增值稅統一稅率，以及將企業所得稅從 25% 進一步降至 19%。這些改革有助於促進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斯洛伐克 2009 年歐元採用有助於塑造其經濟收斂。雖然世界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增長放緩，但斯洛伐克在 2009-16 年期間仍保持了比捷克高 0.9 個百分點的 GDP 增長優勢（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雙邊貿易持續增長，旅遊往來頻繁，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化。許多斯洛伐克人仍然使用捷克語，兩國的電視節目與流行文化也相互影響。這種友好關係不僅增進了民眾的相互理解，也為區域穩定提供了基礎。加入歐盟後，V4 集團的功能有所調整。隨著四國都成為歐盟成員，它們在歐盟內部的政策協調變得更加重要。在歐盟事務上，V4 四國經常形成共同立場，特別是在移民、能源與俄羅斯政策等問題上。這使得 V4 集團成為歐盟政治版圖中一個重要的區域集團。

V4 為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分離後維持友好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通過這個多邊框架，兩國能夠在避免雙邊敏感問題的前提下，專注於共同利益的合作。<sup>30</sup>這種「多邊化」策略有效地緩解了可能出現的雙邊摩擦，為關係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Dubský & Kočí, 2020）。政策協調的多領域擴展展現了 V4 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在外交政策方面，V4 成員國在歐盟、北約等國際組織中形成共同立場，增強了中歐的話語權。在經濟合作方面，V4 推動區域內貿易、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如能源安全項目和交通網絡建設。在文化交流方面，通過國際維謝格拉德基金會資助教育、文化項目與學術研究，增強了區域認同。V4 合作的成功經驗表明，區域組織可以有效地促進成員國間的關係發展。對於捷克與斯洛伐克而言，V4 不僅是合作平台，更是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國通過 V4 向外界展示了中歐國家團結合作的積極形象。

當前挑戰與未來前景反映了區域合作的動態性質。儘管 V4 為兩國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但該組織也面臨一些挑戰：民粹主義的影響導致部分成員國在移民政策與歐盟關係上出現立場分化（Kaniok & Hloušek, 2025）。對俄政策分歧，特別是 2022 年俄烏戰爭後，匈牙利的親俄立場引發內部分歧；歐盟政策差異，捷克與斯洛伐克傾向親歐，而其他成員國在司法改革等議題上與歐盟存在分歧（Mesežnikov, 2021: para. 12; Riepl & Zavarská, 2023）。

<sup>30</sup> V4 合作為斯洛伐克的復歸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弗拉基米爾·梅恰爾仍在執政時，維謝格拉德鄰國為斯洛伐克保留了位子。1998 年政府更迭後，斯洛伐克重新取得保留中的席位，V4 在安全領域的優先事項之一就是盡快完成斯洛伐克的北約一體化（Visegrad Group, 2011）。

然而，這些挑戰並未損害 V4 的合作基礎。捷克與斯洛伐克在大多數問題上保持了相似的立場，這種一致性為 V4 的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因素。

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都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國際地位，但兩國在發展路徑、國際影響力和外交戰略方面仍存在一定差異。積極成就的共同特徵體現了天鵝絨分離的成功。兩國都成功加入了歐盟和北約，實現了「回歸歐洲」的目標；都建立了穩定的民主制度，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都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升；都在中歐區域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升了整個地區的國際地位。發展差異的結構性因素反映了兩國不同的稟賦和選擇。在經濟規模方面，捷克的 GDP 約為斯洛伐克的兩倍，這種差異既有歷史原因，也與兩國的經濟政策相關。在國際影響力方面，捷克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度更高，布拉格作為中歐重要城市的地位更為突出。在政治穩定性方面，捷克的民主制度相對更加穩定，而斯洛伐克偶爾還會面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挑戰<sup>31</sup>。

外交戰略的微妙差異體現了兩國對歐洲一體化的不同態度。捷克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表現出一定的「歐洲懷疑主義」傾向，對歐盟的進一步政治整合持謹慎態度；斯洛伐克則相對更加親歐，將歐洲認同作為國家認同建構的重要框架。<sup>32</sup>這種差異在歐元區加入、移民政策等具體問題上有所體現。未來發展的趨勢判斷需要考慮多重因素的影響。兩國關係的基本穩定性不會改變，V4 框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歐盟一體化的深化可能會對兩國的政策協調提出新要求；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將為兩國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但也會帶來新的挑戰。

總體而言，天鵝絨分離對兩國國際地位的影響是積極的。分離使兩國能夠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求制定獨立的發展戰略，同時通過區域合作維持了友好關係。這種「分離而不分裂、獨立而不疏遠」的發展模式為其他面臨類似挑戰的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sup>31</sup> 捷克的民主制度相對更加穩定，而斯洛伐克偶爾還會面臨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挑戰。

2016 年極右政黨 ESNS 進入議會，反映了反民主趨勢的出現 (Trantidis, 2021)。

<sup>32</sup> 學術研究揭示了兩國對歐洲一體化的不同態度 (Halás, 2014)。

## 陸、結論

天鵝絨分離之所以能在沒有暴力衝突的情況下實現，並非偶然，而是多個層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國際、區域到兩國層面，我們可以識別出決定分離成功的關鍵要素。在國際層面，冷戰結束後西方民主國家對東歐民主化與市場化改革的支持，為和平分離奠定了基礎。無論捷克斯洛伐克選擇統一還是分離，只要遵循民主與和平的程序，都能獲得國際認可與支持。這種國際環境消除了通過暴力實現目標的必要性，也為制度化談判創造了條件。在區域層面，中歐國家普遍遵循民主化與西方融合的共同道路。維塞格拉德集團作為區域合作機制，為四國（包括捷克與斯洛伐克）的政治協調提供了平台。分離後，兩國在 V4 框架內的持續合作，表明了地區國家可以在不同政治體制下實現合作。這種區域合作機制有助於維持和平，防止民族主義情緒的激化。在國家層面，捷克與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首先取決於其政治精英的戰略理性。梅恰爾與克勞斯雖然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但都認識到分離是解決聯邦僵局的必要選擇。他們採取了制度化的談判方式，通過正式的法律程序確立分離的合法性。這種精英主導的理性決策相對於民族主義的情緒化訴求，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議制的優勢。

其次，兩國都繼承了 1989 年非暴力革命建立的和平政治文化。天鵝絨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專制統治，為民主化提供了範例。這種非暴力的成功經驗鼓勵人們在處理後續的政治分歧時也採取和平方式。相比之下，南斯拉夫的情況則相反：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恩怨、強人政治的鼓動與國際干預的缺乏，導致了暴力衝突的升級。

再者，經濟互補性與相互依存雖然沒有根本上阻止分離，但促進了分離後的和平合作。捷克的工業優勢與斯洛伐克的農業基礎創造了自然的經濟分工與貿易互補。分離後，兩國的貿易關係不僅沒有中斷，反而在市場化改革與歐洲一體化的推動下得以加強。這種經濟相互依存有助於維持兩國之間的和平關係。

最後，對民族主義的有效管理至關重要。斯洛伐克民族主義雖然強烈，但在梅恰爾的領導下，它被轉化為理性的政治訴求，而非極端的民族衝突

(Nikodým, 2023)。同時，捷克人對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尊重與妥協，避免了民族主義的進一步激化。這種對民族主義的理性管理與有效引導，是和平分離的重要保證。

天鵝絨分離案例也為當今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多民族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啟示。第一，精英決策與民意的平衡。梅恰爾與克勞斯的決策雖然在當時缺乏廣泛的民眾支持（僅約 36-37% 支持分離），但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這表明，在複雜的政治問題上，政治精英的戰略眼光有時比短期的民意更為重要。政治領袖需要具備超越短期民意、進行長期戰略規劃的能力。這對民粹主義盛行的當代政治而言，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第二，制度化談判的重要性。天鵝絨分離之所以能和平進行，在於兩國採取了制度化的談判方式，而非民族主義情緒的對抗。正式的談判結構、法律程序與文件化的協議，有助於將潛在的衝突轉化為理性的協商。這對其他面臨分離主義運動的國家而言，強調了通過制度化渠道處理民族衝突的重要性。（Holigova, B 2017）

第三，包容性的民族主義管理。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滿足並未導致對少數民族或捷克人的壓迫。相反，分離後兩國都建立了相對民主的體制，保護了少數民族的權利。這種包容性的民族主義管理方式，相對於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與和平。

第四，區域合作與國際融合的促進作用。維塞格拉德集團與後來的歐盟成員身份，強化了中歐地區的一體化。這種區域合作與國際融合有助於消除國家間的對立，促進相互理解與合作。對其他地區而言，加強區域機制建設與國際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民族衝突升級為武裝衝突的風險。

第五，歷史政治文化的影響。1989 年的非暴力革命為整個社會樹立了和平解決政治問題的榜樣。這種政治文化的積累與繼承，對於後續和平分離的實現至關重要。當代國家應當重視建立與強化和平、理性的政治文化，這是長期社會穩定的基礎。

對於台灣而言，天鵝絨分離案例也提供了一些啟示。雖然台灣的情況與捷克斯洛伐克有很大差異，但某些原則仍然具有參考價值。首先，政治精英的理性決策與戰略遠見對於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至關重要。台灣的民主政

治應當鼓勵各政治陣營超越黨派與民族主義的短期訴求，進行長期的戰略規劃。其次，制度化與法律化的處理方式有助於避免衝突的升級。第三，包容性與多元化的政治文化對於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台灣應當繼續培養尊重少數意見、接受政治多元性的社會氛圍。最後，國際融合與區域合作可以有效降低衝突的風險。台灣應當積極參與地區與全球的經濟、文化與科技合作，強化相互依存與相互理解。

天鵝絨分離的成功最終取決於人類的理性選擇。當民族情感與地緣政治利益相互衝突時，人類社會面臨著兩種可能的結果：暴力衝突或和平協商。梅恰爾與克勞斯選擇了後者，使得兩國人民免於戰爭的苦難，同時也為後代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種選擇體現了現代民主國家對理性、法治與和平的承諾。然而，「分割國家是當下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這不是因為分離本身是最優的，而是因為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分離成為了避免更大衝突的必要選擇。30 多年後的今天，捷克與斯洛伐克都成為了繁榮民主的國家，兩國人民也維持了友好的關係。這個案例證明，和平分離不是以失敗告終，而是開啟了兩個國家各自發展的新的歷史篇章。

## 參考文獻

- Abrahám, Samuel. 2002. "The End of Illiberal Democracy in Slovakia? An Analysis of the 1998 Election." *Eurozine*, August 12 (<https://www.eurozine.com/the-end-of-illiberal-democracy-in-slovakia/>) (2025/12/14)
- Bacisin, Vladimir. 1999. "Attacks on the Press in Slovakia - 1998."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February (<https://www.refworld.org/reference/annualreport/cpj/1999/en/55320>) (2025/12/14)
- Bakker, Edwin. 1998. "Growing Isolation: Political and Ethnic Tensions in the Slovak Republic." *Helsinki Monitor*, Vol. 9, No. 1, pp. 23-36.
- Bakker, Edwin. 1999.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Slovakia's Minorities," in S. Trifunovska, ed. *Minorities in Europe Croatia, Estonia and Slovakia*.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 Barbieri, Roberta. 1992. "Czechoslovakia's Movement toward a New Constitution: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a Democratic, Multinational State." *NY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3, No. 1, pp. 105-24.
- Basta, Katarína, and Lenka Bustiková. 2016. "Concession and Secession: Constitutional Bargaining Failure in Post-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2, pp. 470-90.
- Bůček, Ján. 2010.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Slovakia: Spatial Dimens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Human Geography*, Vol. 4, No. 2, pp. 67-88.
- Bunce, Valerie. 1999. "Peaceful versus Violent State Dismemberment: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7, No. 2, pp. 217-37.
- Capek, Ales, and Gerald W. Sazama. 1993. "Czech and Slovak Economic Rela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5, No. 2, pp. 211-35.
- Chase, Robert S. 1997. "Markets for Communist Human Capital: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s, No. 778 (<https://elischolar.library.yale.edu/egcenter-discussion-paper-series/778/>) (2025/12/14)
- Cox, Robert Henry, and Erich G. Frankland. 1995. "The Federal State and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Publius*, Vol. 25, No. 1, pp.

71-88.

- Czech Radio*. 1992. "July 1992: Slovak Declaration Kickstarts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July 17 (<https://english.radio.cz/july-1992-slovak-declaration-kickstarts-breakup-czechoslovakia-8755785>) (2025/12/14)
- Czech Radio*. 2022. "It Was Falling Apart Itself: Czechoslovakia's Velvet Divorce." February 2 (<https://english.radio.cz/it-was-falling-apart-itself-czechoslovakias-velvet-divorce-8771087>) (2025/12/14)
- Deegan-Krause, Kevin. 2006. "Slovakia's New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Meeting Report 325, June 29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325-slovakias-new-government-comparative-perspective>) (2025/12/14)
- Deets, Stephen. 2009. "Constituting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in a Two-Level Game: Understanding the Gabčíkovo-Nagymaros Dam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5, No. 1, pp. 37-56.
- Deets, Stephen. 2011. "Solving the Gabčíkovo-Nagymaros Dam Conflict."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171-solving-the-gabcikovo-nagymaros-dam-conflict>) (2025/12/14).
- Dubček, Alexander. 1978. "Some Aspects of Czechoslovak Society Since 1968." *Social Forces*, Vol. 57, No. 2, pp. 419-35.
- Dubský, Zbyněk, and Kateřina Kočí. 2020. "Quo Vadis, V4? What Is the Potential of the Czech Republic to Promote Its Interes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V4?"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No. 56, 255-80.
- Erdősová, Andrea. 2022.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Slovakia," in Lóránt Csink, and László Trócsányi, eds.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in Central Europe: Analysis on Certa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p. 149-72. Miskolc: Central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in.
- Fiałkowska, Kamila, Elżbieta Mirga-Wójtowicz, and Michał P. Garapich. 2024. "Unequal Citizenship and Ethnic Boundaries in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Polish Roma."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52, No. 2, pp. 461-81.
- Fidrmuc, Jan, Julius Horvath, and Jarko Fidrmuc. 1999. "The Stability of Monetary Unions: Lessons from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7, No. 4, pp. 753-81.

- Gluchman, Vasil. 2022. "The 19th-century Slovak National Movement: Ethos of Plebeian Resistance."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51, No. 6, pp. 1263-80.
- Gould, John, and Soňa Szomolányi. 2000. "Slovakia: Elite Disunity and Convergence," in John Higley, György Lengyel, eds. *Elites after State Socialism: Theories and Analysis*, pp. 57-69. Boulder: Rowman & Littlefield.
- Halás, Marian.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Selected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European Review*, Vol. 22, No. 3, pp. 414-31.
- Hanley, Seán. 2004. "A Nation of Sceptics? The Czech EU Accession Referendum of 13–14 June 2003."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7, No. 4, pp. 691-715.
- Havlat, Michal, David Havrlant, Robert Kuenzel, and Allen Monks. 2018.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European Economy Economic Briefs*, No. 34 ([https://economy-finance.ec.europa.eu/system/files/2018-03/eb034\\_en.pdf](https://economy-finance.ec.europa.eu/system/files/2018-03/eb034_en.pdf)) (2025/12/14)
- Heijmans, Philip. 2017. "Recalling a Velvet Divorc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December 29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17-12-29/memories-of-a-dissolved-czechoslovakia-stir-ambivalence>) (2025/12/14)
- Hilde, Paal Sigurd. 1999. "Slovak Nationalism and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1, No. 4, pp. 647-65.
- Hoensch, Jörg K. 1987. "Slovakia: 'One God, One People, One Party!' The Development, Aims, and Failure of Political Catholicism.," in Jörg K. Hoensch, and Richard J. Wolff, eds. *Catholics, the State, and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1919-1945*, pp. 158-81. Boulder, Col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 Holigová, Bohumila. 2017. "Drawing Lessons from Dissolution of Czechoslovakia in Addressing Possible Brexit Implications."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 13, No. 12, pp. 312-21.
- Hudek, Adam, and Juraj Benko. 2024. "Slovak National Communism in Interwar Czechoslovakia."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53, No. 4, pp. 1-21.
- Hudek, Adam. 2015. "The Unlucky Seven: Too Many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ev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lovak National Uprising in August 2014." *Cultures of History Forum*, April 12 (<https://www.cultures-of-history.uni-jena.de/debates/the-unlucky-seven>) (2025/12/14)
- Innes, Abby. 1997.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the Impact of Party Development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Stat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 Vol. 11, No. 3, pp. 393-435.
- Jefferson, Kurt. 1994. "Understanding Developing European Party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Czechoslovakia." *America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15, pp. 329-38.
- Kaniok, Petr and Hloušek, Vladimír. 2025. "Visegrad Four as an Institution in Times of EU Crises."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6, No. 5, pp. 1-19.
- Kochenov, Dimitry. 2010. "The Case of the Roma Exclus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 6, No. 1, pp. 40-61.
- Komjathy, Anthony. 1979. "The First Vienna Award (November 2, 1938)."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Vol. 15, pp. 130-56.
- Koucký, Josef. 1990. "Czechoslovak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25, No. 4, pp. 361-78.
- Krapfl, James. 2009. "Civic Forum, Public against Violence, and the Struggle for Slovakia." Berkeley Program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Studies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410258c8>) (2025/12/14)
- Kundu, Shrabana. 2024. "Unveiling the Means and Motivations of Defence Modernisation in Mid-power Eastern Europe: Is This Modernisation En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Journal of Scientific Pape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Vol. 14, pp. 210-25.
- Lorman, Thomas. 2019. *The Making of the Slovak People's Party: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e War in Early 20th-Century Europ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 McAdams, Lisa. 1997. "Slovakia: Domestic Problems Responsible for NATO Failur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July 9 (<https://www.rferl.org/a/1085843.html>) (2025/12/14)
- Machonin, Pavel, Milan Tuček, and Martin Nekola. 2006. "The Czech Economic Elite after Fifteen Years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2, pp. 537-56.
- Mesežnikov, Grigorij. 2021. "Democratic Breakdown and the Rise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Slovakia: Interrelated Trends?" (<https://www.iwm.at/europes-futures/publication/democratic-breakdown-and-the-rise-of-right-wing-extremism-in-slovakia>) (2025/12/14)
- Mesežnikov, Grigorij. 2004. "Slovakia's Road to NATO."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Vol. 13, No. 1, pp. 48-69.

- Mesežnikov, Grigorij; Kollár, Miroslav; Vašečka, Michal. 2008. "Nations in Transit 2008 - Slovakia." Freedom House  
(<https://www.refworld.org/reference/annualreport/freehou/2008/en/59668>)  
(2025/12/14)
- Mikuš, Dalibor. 2021.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Churches as Actors of Public Policy in Slovakia." *Central European Papers*, Vol. 9, No. 1, pp. 55-67.
- Naxera, Vladimír & Krčál, Petr. 2016. "The Slovak National Uprising as a National Treasure? Interpretation and Legacy of the SNU in Slovak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National Mythology." *Annu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 Vol. 10, No. 1, pp. 83-102.
- Naegele, Jolyon. 1998. "Slovakia: Democratic Opposition Has Chance to Change Policie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28  
(<https://www.rferl.org/a/1089585.html>) (2025/12/14)
- Nikodým, Tomáš. 2023. "The Persistence of National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Cosmos + Taxis: Studies in Emergent Order and Organization*, Vol. 11, Nos. 5-6, pp. 51-68.
- New York Times*. 1997. "Slovak Referendum Fails to Resolve NATO Issue." May 26 (<https://www.nytimes.com/1997/05/26/world/slovak-referendum-fails-to-resolve-nato-issue.html>) (2025/12/14)
- OECD. 1994. "OECD Economic Surveys: The Czech and Slovak Republics 1994."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oecd-economic-surveys-czech-republic-1994\\_eco\\_surveys-cze-1994-en.html](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oecd-economic-surveys-czech-republic-1994_eco_surveys-cze-1994-en.html)) (2025/12/14)
- Pani, Marco. 2000. "Unemployment in Slovakia." In *Slovak Republic: Selected Issues and Statistical Appendix*, IMF Staff Country Report No. 00/115.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Piscová, Magdaléna, ed. 2006. *Slovakia on the Way to Gender Equality*. Bratislava: Institute for Sociology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s://sociologia.sav.sk/en/publikacie.php?id=1147>) (2025/12/14)
- Prečan, Vilém. 2011. "The Slovak National Uprising: the Most Dramatic Moment in the Nation's History," in Mikuláš Teich, Dušan Kováč, and Martin Brown, eds. *Slovakia in History*, pp. 206-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idham, Geoffrey. 2002. "Coalition Behaviour in New Democrac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Slovakia."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 18, pp. 75-102.
- Research in Slovakia. n.d. "Economy." Slovak Academic Information Agency (SAIA) (<https://www.researchinslovakia.saia.sk/en/main/welcome/about-slovakia/economy>) (2025/12/14)
- Riepl, Tomáš, and Zdeněk Zavorský. 2023. "Towards a Greener Visegrád Group: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wiiw Policy Notes and Reports*, No. 64 (<https://wiiw.ac.at/towards-a-greener-visegrad-group-progress-and-challenges-in-the-context-of-the-european-green-deal-dlp-6430.pdf>) (2025/12/14)
- Ritter, Daniel P. 2012. "Civil Society and the Velvet Revolution: Mobilizing for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 *COSMOS Working Papers*, 2012/04 (<https://cadmus.eui.eu/server/api/core/bitstreams/342f0a53-de96-56e9-a6fc-73f3c08615c9/content>) (2025/12/14)
- Rychlík, Jan. 2018. "The 'Velvet Split' of Czechoslovakia (1989-1992)." *Politeja*, No. 57, pp. 169-88.
- Sardelić, Julija. 2015. "Romani Minorities and Uneven Citizenship Access in the Post-Yugoslav Space." *Ethnopolitics*, Vol. 14, No. 2, pp. 159-79.
- Smith, Simon. 2001. "Local Culture in Slovakia." *Sociológia - Slovak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3, No. 6, pp. 569-92.
- Schmögnerová, Brigita. 2020. "Slovakia's Threefold Transformation."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3207/slovakias-threefold-transformation>) (2025/12/14)
-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n.d. "Information Page of SAS Organisation." ([https://www.sav.sk/?lang=en&doc=ins-org-ins&institute\\_no=21](https://www.sav.sk/?lang=en&doc=ins-org-ins&institute_no=21)) (2025/12/14)
- Sobotka, Eva. 2007. "Human Rights and Roma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Poland," in Erin Bernard, and Barbara Gorny, eds. *Roma Rights and Policy 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135-61.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Struhárová, Beata. 1999. "Disparate Impact: Removing Roma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European Roma Rights Center, April 3 (<https://www.errc.org/roma-rights-journal/disparate-impact-removing-roma-from-the-czech-republic>) (2025/12/14)
- Suk, Jiří. 1990. "Czechoslovakia in 1989: Causes, Results, and Conceptual Changes,"

- in Wolfgang Mueller, Michael Gehler, and Arnold Suppan, eds.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A Handbook*.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pp. 137-60.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Szomolányi, Soňa. 2004. "Slovakia: From a Difficult Case of Transition to a Consolidated Central European Democracy," in Tadayuki Hayashi, *Democracy and Market Econom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re New Institutions Being Consolidated?* pp. 149-188.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 Tomas, Domagoj. 2023. "Croatian and Slovak Political Catholicism and Clericalism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Review of Croatian History*, Vol. 19, No. 1, pp. 245-77.
- Tonu, Constantin. 2024. "The Pan-Slavic Utopian Imaginary." *Caietele Echinox*, Vol. 46, pp. 283-98.
- Trabucco, Fabio. 2020. "La evolución de las herramientas del referendun nacional en el marco comparativo de República Checa y Eslovaquia." *Cuadernos de Derecho Transnacional*, Vol. 12, No. 2, 633-59.
- Trantidis, Aris. 2021. "Build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trategies for Autocratisation and Resistance in Belarus and Slovaki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1, pp. 115-39.
- Tůma, Milan. 2006. "Relics of Cold War: Defen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06/sipri-policy-papers/relics-cold-war-defence-transformation-czech-republic>) (2025/12/1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Resolving the Czechoslovak Gold Dispute." (<https://adst.org/2016/08/resolving-czechoslovak-gold-dispute/>) (2025/12/14)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The Velvet Divorce: A Peaceful Breakup in Post-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https://adst.org/2020/01/the-velvet-divorce-a-peaceful-breakup-in-post-communist-czechoslovakia/>) (2025/12/14)
-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1995. "Poverty, Children and Policy: Respo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 Economics in Transition Studies." Regional Monitoring Report, No. 3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52189>) (2025/12/14)
-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 1999. "Selecte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Relating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 Employment in the Slovak Republic.” Working paper, ECE/CES/SEM.44/WP.16 (<https://unece.org/fileadmin/DAM/stats/documents/ece/ces/sem.44/wp.16.e.pdf>) (2025/12/14)
- Velkova, Angela. 2013. “The Decline of the Czechoslovak Marriage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Velvet Divorce.”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 9, No. 19, pp. 26-32.
- Villa Tugendhat Archives. 2022. “The Agreement to Divide Czechoslovakia was signed at Villa Tugendhat.” (<https://www.tugendhat.eu/en/pred-dvaceti-lety-byla-vevile-tugendhat-podepsana-smlouva-o-rozdeleni-ceskoslovenska/>) (2025/12/15)
- Visegrad Group. 2011. “Visegrad Group: History, Documents, and Bibliography.” (<https://www.visegradgroup.eu/home/documents/bibliography/visegradarrival-survival-120628>) (2025/12/14)
- Wemer, David A. 2013. “Europe’s Little Tiger? Reassessing Economic Transition in Slovakia under the Mečiar Government 1993-1998.” *Gettysburg Historical Journal*, Vol. 12, No. 1, pp. 96-112.
- Wolchik, Sharon L. 1990. “Czechoslovakia’s ‘Velvet Revolution.’” *Current History*, Vol. 89, No. 551, pp. 413-37.
- World Bank. 1994. “Slovakia Restructuring for Recovery.”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615841468759587882/pdf/multi0page.pdf>) (2025/12/14)

# The Velvet Separation: Negotiating the Czech-Slovak Dissolu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Hung-Lin Yeh\*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Kainan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 Abstract

On 1 January 1993, Czechoslovakia was peacefully dissolved into two sovereign states: the Czech Republic and the Slovak Republic. Widely referred to as the “Velvet Separation,” this episod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ew cases globally where state disintegration was accomplished through peaceful means. Asymmetrical trajectorie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intensified disagreements over federal design and macroeconomic policy,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viding fertile ground for the rise of Slovak nationalism. In the wake of the June 1992 federal elections, Czech leader Václav Klaus and Slovak leader Vladimír Mečiar initiated negotiations that, by July 1992, resulted in a political agreement on separation terms and laid the legal foundations for dissolution. The success of this process can be attributed to strategic foresight of political elites, readiness to accept compromise, and pursuit of mutually beneficial arrangemen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identifies the core conditions that enabled a peaceful outcome, and assesses how the separation reshape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both successor states, drawing broader insights in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ultiethnic states may undergo peaceful dissolution.

**Keywords:** Czechoslovakia; Velvet Separation; Václav Klaus; Vladimír Mečiar; Visegrád Group

---

\* shozaemonjp@gmail.com °